

# 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及其政治意义

冯 莉

**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个体的崛起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趋势, 这被学者们称为“个体化”的社会变迁进程被学界认为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及其变革模式和趋势的重要视角。由此, 个体化被中国社会发展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个体化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上分析,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更是在驱动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和推进中国当代政治参与及国家治理的过程中, 通过努力形塑新的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 获得了更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个体化; 中国社会; 政治转型; 政治参与; 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4)12-0020-08

**DOI:** 10.13644/j.cnki.cn31-1112.2014.12.003

**作者简介:** 冯 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克莱姆森大学访问学者 (上海 200020)

## 一、引 言

宽泛而言, “个体化”概念描述的是有关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乌尔里希·贝克认为, 这种转变并非 20 世纪下半叶所特有, 而是在文艺复兴中、在中世纪宫廷文化中、在新教的内在苦行主义中、在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家庭代际纽带的松动过程中都出现过<sup>①</sup>。随着高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弊端逐渐凸显, 欧美特别是欧洲大陆新一波的个体化浪潮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成了西方学者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直到世纪之交以后,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才逐渐汇聚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中<sup>②</sup>。此时,

收稿日期: 2014-06-30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 《个体化》, 李荣山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35 页。

② 相关研究成果, 著作主要有 [美] 阎云翔,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2009); Zygmunt Bauman *Individualized Society* (2001)、*Liquid Life* (2005)、*Collateral Damag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a Global Age* (2011); Ulrich Beck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2002); Mette H. Hansen & Rune Svarverud (eds), *The rise of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2010); 沈奕斐 《个体家庭 iFamily: 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 (2013), 等等。论文主要有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Sep), 1991; Stig Thøgersen & Ni, “‘He is He, and I am I’: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mong China’s Rural Elderly,”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 (1), 2010; Ha Jin, “Individualism Arrives in China,”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 (1), 2003; 张良 《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化与乡村社会重建》, 《浙江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朱敏、王海明 《个体、社会与乡村社会转型——以个体化为视角》, 《晋阳学刊》2009 年第 4 期, 等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随着世界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而空前加快,催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突飞猛进,也加快了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在通过采用大量实证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和比较分析后,认为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是独特的,与欧洲式、美国式、伊斯兰式现代性等概念化的个体化进程不一样,也使得欧洲的个体化路径不再被认为是原创的、正确的、正统的。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对欧洲个体化路径的单纯复制,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sup>①</sup>。而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背后是中国社会个体的崛起,社会从集体化时代走到了个体化时代,个体的解放成了当前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需,也成为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及其变革模式和趋势的重要视角。本文即是从这一视角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所带来的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转型和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我们已经走向了个体化时代。历史上,现代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号召救亡图存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双重作用下,个体挣脱家族(宗族)的枷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重建、民族的兴亡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并迅速凝结在整个国家运作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成为集体的一分子。这样,个体从“个体-祖先”的轴线上抽离并嵌入在“个体-党和国家”的轴线上,和国家直接面对面<sup>②</sup>。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集体所有制的逐渐瓦解,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 (一) 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表征

首先,从改革开放前后社会整体的发展比较来看,1978年以前,中国是“总体性社会”,国家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配置,在城市建立“单位型”组织,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不仅对政治经济进行全面的干预和控制,而且还完全包办了公民个人的生产生活<sup>③</sup>。从物质到精神,不论生活方式还是生活习惯,政府成为整个社会的“大家长”。这种总体性的社会管理模式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社会支持,但却因为过于强调集体和公平,忽视个体和效率,严重阻滞了生产力发展。

1978年以后,个体的解放出现了新的契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个体意识大大增强,个人与单位集体的关系渐渐疏远,人们不再把单位看成个人生活的全部归属,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清晰分明。与此同时,单位和个人身份分离,城乡社会自由流动解禁。1985年7月,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在城镇暂住时间超过三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要申领暂住证。这意味着,继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用政府管制的方式将人口严格固定在户口所在地27年之后,中国公民首次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在非户口所在地长期居住。随之,便于个人使用和社会管理的身份证普及,人口自由流动的禁忌被破除,人们只需携带身份证,就可以通行全国,自谋出路。1980年代的下海潮,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施行后一直持续至今的进城打工潮,大量的人口流动虽然带来了城市管理的困难,但是却无疑催生了个体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

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和配置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发展结构中的异质性因素越来越多,原有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直到进入新世纪,异质性导致社会产生“断裂”,继而断裂的社会又很快碎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和城市化进程把传统社会的关系纽带全部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情感关系为主而更多地变成了契约性关系。个体比集体重要,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 《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② [美]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③ 李强 《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8页。

“我”比“你”重要,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逐步加快必须不断地被重新塑造却又无法稳定和长久,国家在对个体快速松绑为自身“减负”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个体化的冲击下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其次,从个体而言,这种个体化表征主要表现在:个体的自由度和可选择机遇空前增加;个体倾向于把个人目标的追求置于集体目标之上;了解并通过自身努力满足自我需要;以自我或个体为中心的解构倾向;主要基于自己的信仰和态度并根据自身的目标和需要决定个体定位等<sup>①</sup>。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式微的结果,因为它“违背基本的人性,自然无法持久”<sup>②</sup>。另一方面,也是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带来的个体之间竞争的无限加剧,再加上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日益增多,个体更加关注的是自我实现和个体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在个体的人生中不再是一切。至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个体化时代终于来临,个体在婚姻、就业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机遇的同时,却也给社会和自身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中,社会面临市场的统治,“幸福生活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本身”<sup>③</sup>。个体化意味着生活在所有方面对市场的依赖,人们被扔进了劳动力市场,确切地说,个体化“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塑造以及在政治上结构化生涯和生活境况的能力”<sup>④</sup>。这样,“不充分就业的风险社会体系”开始出现,“彻头彻尾的工资劳动社会”里,终身的全职工作的形式被各种各样的工作时间的灵活方式所打破,但换来的是一种普遍的就业不安全感,“进步与伤痛以一种新的方式相互渗透在一起”,“工人以从工作中得到的一点点自由换来了新的束缚和物质上的不安全感”<sup>⑤</sup>。换句话说,“工作稳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人必须视自己为一套技能组合,随时可以游走于江湖”<sup>⑥</sup>。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曾对此有过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已经变为一场马拉松赛,即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掉队的则因为年龄和教育的阻碍,已没有可能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sup>⑦</sup>。

## (二) 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原因

实际上,现代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自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只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才快速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本文认为,除了文化和思想上“大我”的解体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这个进程的主要原因还包括:

首先,个人主义的催化<sup>⑧</sup>。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自由的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个体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认同”没有“自我-认同”,哪怕是个人主义,也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自觉。刘再复在讲中国具体语境中的主体性的时候也认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是缺少个人主义的。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主义的失灵,局势发生了根本改观,“随着中国人传统道德感的下降,特别是年轻人总是对旧事物进行批评,他们的个人价值意识越来越强烈,人们考虑的是能挣多少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个体与国家之间因为个体有自己的事业和工

① Dubois, N. & Beauvois, J. L., “Normativeness and Individu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

② 许纪霖 《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

③ [英]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邹建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引言第23页。

④⑤ 参见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何博闻译, 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第173—175页。

⑥ [美] 理查德·隆沃思 《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 应小端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第73页。

⑦ 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第1页。图海纳的这个形容最初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法国社会而言的, 孙立平教授认为, 这种马拉松式的比赛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⑧ “个体化”和“个人主义”的概念不一样, 前者描述的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和社会关系结构性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获得的是自身不断的解放。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认为行为目的只能为我、个人价值至高无上, 从而把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道德总原则的理论。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因此, 个人主义是个体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而不再事事都直接依赖政府”<sup>①</sup>。个人主义这个备受传统文化排斥、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词汇开始具有了正当性，并在市场经济的助推下催化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和内心道德意识。

其次，国家政策的推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脚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大力推行、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世纪以后高校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制度的施行等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个体化的重要推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开放度越来越高，国家利用政策或律法不断放大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并通过推动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使得国家职能一点点从社会管理的深水区抽离出来。与此同时，个体对集体和国家的认同不再唯一，国家也不再超越或无视个体的利益。国家在放权的同时，个体，这个“被释放的精灵”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召唤下，急速地摆脱了既有的阶层、邻里、婚姻、家庭、职业、地域等的束缚，从而成为致力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塑造的劳动力市场的一员，不断的流动成为个体的生存常态<sup>②</sup>。或者更确切地，如贝克所认为的，在中国，“个体化是政府需要的”<sup>③</sup>。当然这仍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和个体之间已经趋于平等，派伊说“虽然封建时期国家对个人也有过仁慈和怜悯，而且今天的政府也被称为人民的政府，但在个体和国家的关系之间，个体仍然是国家的从属，国家并不建立在个人的权利之上。”<sup>④</sup>

再次，市场经济的驱使。阎云翔认为，在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过程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促进流动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市场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流动机会的增加使得个体能够打破并远离社会群体的约束并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找到其自我发展的方式<sup>⑤</sup>。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活力和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各种配套机制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以竞争为核心理念的市场经济准则把个体送入了劳动力市场从而“自生自灭”。面对如此不确定的未来，各种社会保障政策的不完善加剧了人们心理上的日益焦虑和不安感。一方面，个体的流动资质、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大大增强了，不管“是作为旅行者，还是作为迁徙者”，个体的“流动性已成为普遍现象”<sup>⑥</sup>。另一方面个体又普遍处于焦虑之中，而这种焦虑不仅是个体在尝试自由中带来的，也是整个社会和人类发展所必须面临的。当整体的困难被推给个人之后，中国社会的个体，除了习惯性寻求政府的支援外，更多的是不得不自我“突围”，或奋力向上拼搏，或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回归家庭，或暂时无所适从甚至从此被抛出社会前进的巨流。

### 三、个体化驱动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

对现代化的追求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而出现，应和着近代以来中国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以及国家政策的需求，从而不断地变动发展。所谓政治转型，是指一个政治实体的社会从一种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变化转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无论从何种视角，我们都不能把近代尤其是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完全归功于个体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个体化的驱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才得以更加的顺畅和具有活力。或者说，正是因为个体化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社会推动力、生产力和创造力，促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

① Ha Jin, "Individualism Arrives in China",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 2003. pp. 13-21.

② 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德] 乌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④ Lucian W. Pye, "The State and the Individual: An Overview Interpre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Special Issue (Sep), 1991.

⑤ 参见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德] 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在这里，埃利亚斯描述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本人认为，这种状态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能否通过其所建立的“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sup>①</sup>以巩固既有的革命成果,能否成功地突破革命思维,使无产阶级政党从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共存,跳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格瓦拉困境”<sup>②</sup>,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巨大考验。改革开放以来,以促进党政分开、增强地方分权、重视人大职能、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积极推进基层民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邓小平成功地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大门,使其从革命思维逐渐转变为治理思维。这个过程中,个体化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高度集体化和既有的总体性管理体制带来的是主体积极性的逐渐丧失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迟滞,而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飞速发展,作为国家权力和威权政治的代表和核心,执政党的合法地位无疑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换言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新的机遇和活力,这就是对个体的制度解放,“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作出积极贡献”<sup>③</sup>。因此,不论是基层自治还是党内民主,不论是人大改革还是地方分权(特别是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因为解放了人,才最终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社会活力,并彻底走出了僵化的苏联模式的阴影,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了世界史和当代史发展的潮流。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个体的崛起。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走向纵深,一方面,这场变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一起改变了既有的社会格局,出现了新的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进而形成了上层固化、中层空心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发展模式下国家-个体关系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从个体完全被国家所控制变成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松散、游离甚或背离。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国家-个体之间的控制和被控制是一开始的自愿到后来的强迫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本来呈各自孤立分散状态的单个个体从集体的大口袋中被释放到基层的各个领域,并随着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国家、社会、社群和家庭致力提供的支持下,迅速崛起的个体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就主动完成了“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的大转变,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sup>④</sup>。就此,作为社会转型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体制和人的生存形态发生了重大转折,并催动政治转型在现代化道路上继续发展。

第三,民主政治型态的现代性转变。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在从动员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转变,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分别有不同的政治类型。第一个节点是乡土中国,在一个高度分散的乡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政党和领袖权威为中心的动员型政治,政治推动着社会。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第二个节点上,社会日趋活跃,并对政治提出更多期待,回应型政治应运而生,社会推动着政治。在政治转型中,需要强化政治回应的及时性、主动性、整合性和包容性,注重宏观政治设计、时序选择和地方基层探索。”<sup>⑤</sup>显然,在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7页。

② “格瓦拉困境”源自格瓦拉主义。格瓦拉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家。格瓦拉是理想主义者,也是革命浪漫主义者,他在1955年辅助卡斯特罗完成古巴革命,在古巴革命政府建立后,怀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放弃古巴共产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进入刚果、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试图在那里发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在一次战斗中被俘牺牲。格瓦拉代表的是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征: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活动,革命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离开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烧,精神走向虚无,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与特殊政治活动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主客观原因,这种思维和价值观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时代发生再大变化,都执著而不调适或更易。大多情况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动,只有个别通过自觉。由于后者少之又少,故称为“格瓦拉困境”。参见公方彬《“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人民论坛》2013年第8期 [法]迈克尔·洛伊《切·格瓦拉对新社会主义的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③ [挪]贺美德、鲁纳编《“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许辉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④ 曹锦清《再造“词语”:当前中国思想言说的根本困境》,《文化纵横》2014年第4期。

⑤ 徐勇《现代化进程的节点与政治转型》,《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3期。

二个节点前后, 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期待正是在个体化的趋势中形成的。这种政治转型进程表明,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 国家在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给个体迅速松绑, 无论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 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批工人下岗、高校毕业生双向择业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等等, 都在给予个体更多的自由空间, 同时, 个体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更确切地说,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 中国的个体和个体化已经或即将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做出诸多的牺牲和努力。

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 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正是在个体化的大趋势下得以推动和发展并取得了重要的历史业绩。一个显著的迹象是,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是个体不断被政治解放的过程, 这是由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和国家(政府)的威权体制来决定的, 而且因为改革和发展任务的多层重叠,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不仅不得和国家(政府)变革的节奏一致, 而且必须成为中国追求和完成现代化任务的重要方略。“理解中国个体化的关键在于看到它是中国追寻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策略或者手段。世纪之交以来, 中国精英就已经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 随后在社会层面展开了实践。中国个体化话语与实践中的一条常见主线是, 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 或者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个人必须承担更多责任, 主动付出更多努力”, 因此, “中国个体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 而不是西欧那样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转型”<sup>①</sup>。

#### 四、个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

在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中, 个体通过参与革命和建设使得自身不断发展和获得解放, 相比以前,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和自我表达, 当然也必然伴随着与此相称的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及行为习惯的养成。同时, 个体化也对国家的政治发展彰显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和国家治理两方面。

(一)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属于近代意义上的政治范畴, 也是衡量和影响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变量, 是公民或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sup>②</sup>。1978年,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 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 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全面的集体主义经济开始解体。个体主义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顺势疯长, 在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打破了铁饭碗、终身制、实现了基层群众自治和个体政治表达、政治参与的自由, 特别是突破了地域、婚姻、职业、阶层等的限制, 在个人的意愿和国家的发展意图“一拍即合”后, 个体终于彻底沦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 成为了一切只能靠自己, 只能自己为自己负责的独立的个体。而这个迅速的个体被松绑的过程对政治参与及其民主化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中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例, 基层群众自治正是建立在作为个体的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基础之上, 没有这个前提, 自治就只能是空谈。

从此, 个人主义在中国基层社会自治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机遇。无论是动员型政治参与模式还是后来的法治型政治参与模式,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 并不接受任何外在的干扰, 哪怕仅仅根据名字、肤色、政党派别划分选票, 甚或把选举当成一种消费并愿意接受贿赂, 那也是个体的真实意愿和真实选择, 尽管个体必须在国家已经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控制或自我管理的能力<sup>③</sup>。这样, 政治参与伴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推进直接体现了对个体和个体意愿及其表达的尊重, 反过来也促进了政治参与本身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转变。

(二) 国家治理。如前所述, 个体化带来的是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sup>①</sup> [美]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陆洋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第375—376页。

<sup>②</sup> 在我国, 因为团体在规模和资质等方面的受限以及在作用方面的不明晰, 政治参与的主体, 特别是在基层, 都以单独的个体为主, 因此本文仅以个体叙之。

<sup>③</sup> 因为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的管理下展开的, “国家用诱人的经济或政治回报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第342—345页。

在中国, 促进这种结构性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化所引发的大面积的社会流动, 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不仅带来了城市治理的新课题和农村日益严重的空心化, 更是因此强势地推动着国家治理战略的转变和社会对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实际上正是应和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应对之需。

近些年来, 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把个体解放的过于迅速和彻底, 而与此同时, 社会保障和各种机制体制的不完善, “丛林法则”的日渐严峻, 都使得人们倍感孤立无援。个体化的后果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忍受。正如鲍曼所说“这样割裂的生活容易引发‘横向’而非‘纵向’的生活定位。生活中即将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对不同的机遇、不同的成败几率作出的反应, 这就要求个体掌握一套不同的技能, 或者对其生命资产进行不同的安置。过去的成功不一定会增加未来胜利的机会, 更遑论保证未来马到功成; 同时, 过去证明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必须不断被重新审视和修订, 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 它们可能无一丝用处, 甚至有可能起反作用。比之牢记过去的行为, 并根据从前所学建立的基础来制定人生策略, 迅速并彻底地忘记过时的信息和老掉牙的习惯对未来的成功更加重要。”<sup>①</sup> 一切都在飞快地改变着, 国家不再为个体的幸福负责, 生存环境更是在快速恶化, 陌生人永远是抬头可见、低头可闻、无处不在, 人们时时刻刻都必须面对因此而产生的焦虑、敌对和不安全感, 马斯洛所认为的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也实际上成为人们焦虑和恐惧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 当人们终于为拥有流动的自由而雀跃时, 公正、透明、合理的制度供给却未能及时跟上巨大的社会变迁的脚步。而如果没有为社会成员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或者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在解决问题时能力不足, 便难以赢得民众的认可。当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无法获得民众普遍的信任和认可时, 便出现了“制度容纳力”不足的情况<sup>②</sup>。在这方面, 比较突出的表现是社会的情绪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群体倾向于冲动、多变、急躁、脆弱、专横, 易受暗示和轻信。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个人在群体影响下, 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消失, 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sup>③</sup> 当社会个体依靠个人的力量无法获得某种认可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 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群众的盲从和盲动, 乃至演化为多数人的暴力。以经常伴随死伤加剧官民对立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例, 2000 年以来, 中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 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2005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 1993 年到 2003 年间,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 1 万起增加到 6 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 73 万人增加到约 307 万人。2007 年已经超过 8 万起; 2008—2009 年更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时期, 有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群体性事件发生及引人关注的第一个浪尖”<sup>④</sup>。而这恰恰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或不充分导致的。

造成此种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社会个体化中相应的文化浸润度不够。或者说, 思想启蒙不够彻底。所谓的不够彻底, 不是全盘西化, 而是个体在崛起的过程中, 因为没有自我塑造的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必经的过程, 没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民众普遍认可的对个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具有较强包容能力的精神纽带, 所以面对快速的“集体失联”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发展, 个体的暴力、盲从和情绪化倾向便成为自我发展过程中的毒瘤, 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爆发,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重大冲击。一个很清晰的事实是, 随着经济的增长, 中国宗教信仰的人数、各种因由的群体性事件、城市里啃房族的数量都在逐年增加。从本质上说, 这样的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时代: 生活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 谷蕾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4 页。

② 王建民 《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容纳力”的缺失与重塑——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 《学习与实践》2010 年第 2 期。

③ [美] 熊彼特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与民主》, 吴良健译, 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第 379 页。

④ 海云志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状况与地方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唯实》2012 年第 12 期。

状况是对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治的严重考验,也是对中国个体化未来趋势发展的严重挑战。

阎云翔认为:在中国,“国家在前 30 年,束缚了个体,同时也承担着很多责任,改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把责任推卸到个体身上。这是个体化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跟整个西欧的经历没什么本质区别。西欧的福利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希望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国家没钱来给予从摇篮到坟墓的这么多保障。这跟我们现在做的是同样的事儿”<sup>①</sup>。那么,面对此种情境,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进个体化使得自身负累减轻的同时,也必须为减轻后的责任负总责。改革开放前,国家陷入集体和个体的纠缠之中而无法自拔;改革开放后,这种纠缠在个体和国家的合力之下获得解决。从此,个体不再完全依赖国家(政府),从而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样的,国家也要为减轻自身负担后的行为负责,即必须要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这就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升、国家行政能力和执行力以及制度的快速健全提供了强大的压力和助动力,并由此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

## 五、结 语

对于当今的世界而言,个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它改变着社会发展的结构,正在努力形塑着新的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个体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社会学的专有术语,而必须被认定为是一个交叉学科的范畴。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个体化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转型和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由此被赋予了积极的政治意义。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我们相信,在未来,这种意义仍将持续,并一定会愈来愈受到重视。

(责任编辑: 顾奕君 潇湘子)

###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Feng Li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rising of individual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is process, which is called “individualiza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becomes a cruci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patterns and trends. Thus, Chinese individualization is endowed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considers that, for Chines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individualization not only changes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social systems, but also gains more positive meanings through efforts to shape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society-individuals in driving China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China’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Individualism; Chinese Society;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tate Government

<sup>①</sup> [美] 阎云翔 《个体中国的希望与忧虑》,《法治周末》2012 年 5 月 10 日。